

#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 “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sup>\*</sup>

郑大华

提要：中国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是1904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7、8期上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在清末民初，“民族精神”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人们更多的是受明治维新日本的影响，用“国魂”、“国粹”、“国性”、“立国精神”等来表达“民族精神”的涵义。中国知识界比较多的使用“民族精神”一词是在五四时期。1924年初，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提出了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第一次将“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九·一八”后，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和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问题时，就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展开了充分讨论，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尽管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认识各有不同，但都是从正面认识和肯定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尤其是他们有感于中华民族精神日渐颓废甚至消失，而提出了种种恢复或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张或措施，这些主张或措施不仅是针对他们当时所生存的时代而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是今天看来，其中许多观点仍然有其借鉴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吸取。

关键词：中国近代 民族精神 民族复兴 中国知识界

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7.01.017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民族复兴有一个从思想的萌发、到发展、再到成为社会思潮的历史发展过程。清末民初，是民族复兴思想孕育或萌发阶段，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都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sup>①</sup>五四时期，是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阶段，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

<sup>\*</sup>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批准号：13@zH018）和201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郑大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sup>①</sup>但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的知识界纷纷发表文章,就“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其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sup>②</sup>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可以说是自孙中山以来近代知识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近代知识界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可贵的思想遗产。但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时,对知识界在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缺失。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国知识界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作一探讨。

—

“民族精神”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当时,由于法兰西文化的大规模涌入,德国知识分子感觉到民族认同和民族自尊受到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为了捍卫民族尊严,他们于是大力提倡德意志文化,并提出了“民族精神”(Volksggeist)的概念。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德意志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从德意志历史、文学、民间艺术中探求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源泉,以此来展示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他们的努力不仅为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统一提供了思想资源,对19、20世纪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sup>③</sup>

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是1904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7、8期上的《民族精神论》一文。该文认为,民族精神的有无是欧洲“所以能振兴”和中国“几无存于大地”的原因,中国要在“凄风苦雨之中”实现“早自振臂”,作为“后来之师表”和“同胞之干城”的青年,就应“振其气,坚其志,固其操,不以富贵撓其心,不以生死挠其志,不以目前之小小成败挫折其目的,夫如是亦可以称民族之牺牲者乎!”<sup>④</sup>但在清末民初,“民族精神”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人们更多的是受明治维新日本的影响,用“国魂”、“国粹”、“国性”、“立国精神”等来表达“民族精神”的涵义。比如,梁启超就先后有《中国魂安在否》(1899年)、《国性篇》(1912年)等谈民族精神的文章发表,但用的都不是“民族精神”,而是“国魂”、“国性”等源于日本的词汇。中国知识界比较多的使用“民族精神”一词是在五四时期。

1919年12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发表“隐青”的《民族精神》一文,作者认为,“凡人种、语言、文字、宗教、地理等关系,皆不足为建设民族之根本条件。为今日之民族计,人种之化合渐灭不足忧也,语言文字之灭亡不足忧也,宗教之盛衰变迁之不足忧也,国土之存亡亦不足忧也,所可忧者,其唯民族精神之有无乎!”在作者看来,所谓“民族精神”,既非“以血族为根据”的“人种之意思”,也非“重统治重命令”的“国家之意思”,更非“各个独立”的“个人意思之集成”,而是“自然发生浑然一体之民族自觉的精神而已”。它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外受强敌之压迫,内感生活之困难”。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民族才会有“努力向上之运动”,并在长期的“共同防御、共同生活”中,形成一种“特立不可同化之精神”。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其民族“虽丧地灭国,离散而之四方,其形式上特征遗亡殆尽,而

① 郑大华:《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

② 郑大华:《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③ 参见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载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3—304页。

④ 佚名:《民族精神论》,《江苏》第7、8期,1903年10月20日和1903年11月19日。

彼国固有之文化与民族的精神，终不能湮没也。”据此作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后，“民族自决”思潮和运动兴起，“世界各殖民地之民族，咸跃跃欲试；而列强之对付殖民地也，亦不得不一变其方针。”但实际上“彼列强对殖民地之政策，非真心服人道主义而自愿改变也，亦权其利害之轻重，然有不得不然耳。”所以，广大殖民地之民族，尤其是“吾东亚诸民族”，要想实行“民族自决”，真正获得自由，就必须“扩大其同类意识而努力此民族精神之培养”，否则，所谓“民族自决”，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sup>①</sup>一年后，陈嘉异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上连载《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认为与西方文化比较，东方文化具有四大优点，其中第三点，“东方文化（此亦单就中国言），在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根底，最能运用发展者也。”他和“隐青”一样，也认为一个民族能否成立，“所恃者非仅血统、语言、地理、宗教等关系使然”，而在于能否“形成浑然一体之民族精神”。而民族成立之后，要善于运用民族精神，否则，“则易流为固性的传统思想，而不克随时代之变易以适应其环境，则此精神或且为一时代之障碍物”，这也就是所谓的“时代错误”。各国所以会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民族传统思想与其新时代思想之间的严重冲突。而我国自戊戌变法后西方的新思想新学说纷纷传入，社会思潮发生突变，旧政制和旧思想犹如“落叶之扫”，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人们以为这是西方的新思想战胜我国的旧政制旧思想的结果。但实际上我国的旧政制旧思想之所以败得“如是之易且速”，根本原因在于“此等自身已腐朽，早不适于时代之新要求，即无外来之新思想，亦当归于淘汰者，而具有此淘汰作用之根本潜伏力”，便是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而尤以民族精神为根底”。比如，“三王不沿乐，五帝不袭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等等传统和精神，就是这种优越性的体现。就此而言，陈嘉异强调指出，“吾民族精神之伟大，实有未可妄自菲薄者”。<sup>②</sup>

“隐青”和陈嘉异等人虽然讨论了“民族精神”，但他们并没有将“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五四时期，真正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24年初，亦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孙中山应邀到广州国立师范学校礼堂作“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在讲演中他指出：中国以前是一个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其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还有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独强”。然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地位则“一落千丈”，从“世界独强”沉沦为了“次殖民地”，而“次殖民地”的地位“还不如殖民地”，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先“恢复民族的精神”<sup>③</sup>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呢？孙中山认为，“民族精神”主要体现为“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三个方面。首先就“固有的道德”而言，他指出，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虽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其内容的“固有的道德”，并不像“醉心新文化的人”所说的那样过时了，要加以“排斥”，相反，我们要将它们恢复起来，发扬光大起来。比如“忠”，有的人以为，忠是“忠君”，现在是民国，没有了皇帝，也就不要再讲什么“忠”了。“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忠”，不仅仅是“忠于君”，也可以作“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来解。现在没有了君主，我们“不忠于君”了，但我们还“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要保存。”其他如“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是一样，都是没有过时的“好道德”。尤其是“和平”，是“驾乎外国

① “隐青”：《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1919年12月15日。

②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1921年1月25日。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页。

人”的“一种极好的道德”，“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sup>①</sup>其次，从“固有的知识”的来看，他指出，所谓“固有的道德”，也就是“人生对国家的观念”，具体来说，“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一段话”。这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天下为止”，是一种“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的什么政治哲学都是没有这样的理论，它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然而“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我们要“齐家、治国，不受外国人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做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sup>②</sup>再次，来看“固有的能力”。他指出，现在西方的机器发达，科学昌明，而中国与西方比较要落后得多，因此，“中国人现在的能力当然不及外国人”。但在古代，在几千年之前，“中国人的能力还要比外国人大得多。外国人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如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等。只是“后来失去了那种能力”，民族的地位也因而“逐渐退化”，乃至成了比殖民地还不如的“次殖民地”。因此，我们要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恢复起来”。<sup>③</sup>

孙中山强调指出，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就必须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也就是“我们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但在大力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我们“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孙中山还提出，我们学习外国，不是要“向后跟着他学”，而是要“迎头赶上去”。比如学习外国的科学，不是亦步亦趋的重头再来，而是直接学习外国最先进的东西，这样“便可以减少二百多年的光阴”。“向后跟着他学”，我们永远都会落在别人的后面，只有“迎头赶上去”，我们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赶上和超过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恢复到头一个地位”。<sup>④</sup>

孙中山提出我们要“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必先“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的思想，尤其是他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因为如前所述，此前虽然有人讨论过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但并没有把它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此后，尤其是“九·一八”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和形成，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和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问题时，就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 二

“九·一八”后，推动知识界讨论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之关系的关键人物是张君勱。张君勱早年追随梁启超，参加清末立宪运动。后因国民党迫害，于1929年去了德国，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一天，他才回到北平。回到北平不久，张君勱即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国拿破仑军队占领德国时发表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摘要本。在译稿前面的“引言”中张君勱写道：“数千年之历史中，大声疾呼于敌兵压境之际，胪举国民之受病处，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如菲希德氏之《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可谓人间正气之文字也。菲氏目的在提高德民族之自信心，文中多夸奖德人之语，吾侪外国人读之者，原不求必之一字一句之中，故取倭伊铿氏关于菲氏演讲之摘要本译之，繁重处虽删，而绝不影

<sup>①②③④</sup>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247、247—250、250—251、251—253页。

响于菲氏真面目……呜呼！菲氏之言，既已药亡国破家之德国而大收其效矣，吾国人诚有意于求苦口之良药，其在斯乎。”<sup>①</sup>他认为费氏在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戒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此三原则者，亦即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世有爱国之同志乎！推广其意而移用之于吾国，此则菲氏书之所译也。”<sup>②</sup>1932年7月20日起译稿分五期（即从第一卷第三期到第一卷第七期）在《再生杂志》上连载，并于年底集结成书，由再生杂志社正式出版。《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讲演》节本出版后颇受人们欢迎，不久即销售一空。翌年春夏，又两次再版。正是在张君勱的推动下，当时出现了一个介绍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的小高潮，初步统计，仅《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时代公论》、《教育杂志》、《再生杂志》和《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的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译文（节译或摘译）或介绍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思想的文章就达23篇之多。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节本，还被收入进了1934年出版的《中学国文特种课本》第二册（高中用书）。该课本的文后“题解”写道：“普鲁士之抵抗强敌，复仇雪耻，端赖以是（指费氏的《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引者）。全书凡十四讲，纵论日耳曼民族之特质，自精神方面所见民族与祖国爱之意义，新国民教育之出发点，达到目的之方法等，极其透辟详尽。”而“现在日寇夺去我东北四省之地，我所受之耻辱，不减当年普鲁士之败，我爱国青年，读斯文其亦将有所感动于中而毅然兴起乎？”

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的大量介绍，促进了“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之关系的讨论。陈茹玄指出，“普鲁士败于法兰西以后，几不能自立；而其国内学者，如黑智尔（即黑格尔——引者）、菲希特等，以民族主义号召国人，竭力表扬其日耳曼民族之伟大与优秀。使其人民爱其国而自尊其种，养成刚健雄沉的民族精神”。因此，“吾人今日不愿中国民族趋于灭亡”，就应该向黑智尔（即黑格尔——引者）、费希特等人那样，“设法挽回这颓败的民族精神”。<sup>③</sup>雷震认为，“一个国家之强弱，要视形成此国家之民族精神之兴盛与否以为断，民族精神若是兴旺，这个国家一定强盛，不然一定衰微，故一国之民族精神如何，可视为测度此国强弱之寒暑表也。……中国之所以一蹶不振者，亦由于民气消沉，民族精神颓唐衰废之故耳……所以我们今日要排除国难，要挽救中国，须先从恢复民族精神做起”。<sup>④</sup>“奋勇”认为费希特所强调的两点，即（一）“体力和武备绝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只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胜过一切”；（二）“认民族为永远不朽的团体，要将这种认识用精神的训练，培植于民众心理里面”，正是中国目前所需要的。<sup>⑤</sup>也就是说，要救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费希特所说的自省的精神、爱国的精神是中国所必需的。陈兴高更是明确指出，“在固有民族精神未丧失以前”，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文明最优秀之民族”，其先民“于困难之中，披荆棘，斩草莱，辟疆殖土，征服异国，成东亚一富强无比之大帝国”。但自“民族精神消失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近来外人更以半开化之民族，无组织之国家等等侮辱语，公然加之于吾国家民族之上矣。”因此，“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恢复中国之固有民族精神”。<sup>⑥</sup>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名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的“社评”也认为，“重唤起中国民族固有之精神”，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之必要的原则”。<sup>⑦</sup>邱楠在《复兴民族与复兴民族精神》一文中写道：历史上去看，没有一个民族的灭亡不是因为民族精神的衰落，也没有一个民族的复兴不是由于民族精神的振刷。为什么印度会灭亡，为什么德意志经过上次欧战的大失败，现在还

①②张君勱：《菲希特〈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20日，第1、13页。

③陈茹玄：《我国民族精神颓败之原因及其挽救方法》，《时代公论》第28号，1932年10月7日。

④雷震：《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时代公论》第29号，1932年10月14日。

⑤奋勇：《费希德演说什么叫爱国心》，《国闻周报》第9卷第12期，1932年3月8日。

⑥杨兴高：《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新文化月刊》第6期，1937年6月25日。

⑦《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第3版。

能够抬头？也都是由于民族精神的关系。“因为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核心。只要核心健全，就会发生很大的抵御力。”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复兴民族精神。<sup>①</sup> 寿昌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火并的时代，天灾人祸、内知外患，交相攻袭，我们欲挽救这衰颓的局面，内政外交的整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最基本的则“在民族精神的复兴”。<sup>②</sup> 在林景尹看来：一个国家文化的构成，是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而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民族精神之所寄者此，国家命脉之所托者亦在于此。“故欲求国家复兴，臻于强盛之途，非发扬固有文化，振作民族精神，实不以为功。”<sup>③</sup> 作为左翼学人的郭沫若同样强调，“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sup>④</sup>

“复兴民族是要复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当时知识界的基本共识。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呢？对此，人们的认识有各有不同。王鲁季指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于世界并得到发展，“要在其有不可磨灭之民族精神”，如英国民族的保守沉着，德国民族的尚武图强，日本民族的崇尚侵略，“此皆其民族固有之精神，亦即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之点”。作为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大同主义”、“民本主义”、“德治主义”、“和平主义”和“中庸主义”等方面。在清代以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甚为焕发”，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然而自清入关后，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逐渐丧失了，中国因此而遭受列强的侵略，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吾人诚欲乞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就必须向费希特所说的那样，“非努力发扬固有之民族精神不可”。<sup>⑤</sup> 郑贞文认为，“我民族固有的精神是孝忠仁爱信义和平”。具体来说，如尧舜好察遁言追求至善的精神，大禹平治九州之水公而忘私的精神，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求贤致治的精神，孔子口诛笔伐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历史上每当外侮凭凌中原板荡的时候，不论在朝的士大夫与在野的庶民，或破敌致果视死如归，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大义凛然的气节，都足以表明中华民族之精神的伟大。<sup>⑥</sup>

寿昌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同体同心成仁取义的精神”、“格物致治参赞化育的宏愿”、“修齐治平世界大同的理想”三个方面。首先就“同体同心成仁取义的精神”而言。孔子曾教导我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所谓仁义，即人我合一，我物平等的大德。“仁义的至极，即求成己成物，与理合一，以达于普遍圆满的境界。”古圣先贤对于此项解释，不计其数，而见诸实践方面，更能举出不少例子。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其次，从“格物致治参赞化育的宏愿”来看。中华民族的理想，一向是文质彬彬，体用兼备。换句话说，即理想与实践并重。上述所谓仁义之极，本含有积极性，本是行动的，非特推己及人，更须推己及物。其及物的结果，自非探究天地的奥妙，穷尽世间的物理不可。易言之，即非参赞化育不可。故所谓“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最后，来看“修齐治平世界大同的理想”。《礼记》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仅此一语，就已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高尚的博爱精神。“此种博爱的精神，退足以铲除社会的不平，进足以拯救天下的陷溺。”所以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所欲，更施于人。如果能将中华民族的这一精神发扬光大，“是则资本主义罪恶，帝国主义的侵掠，既无从发生，而国际间长治久安的基础，岂不随之树立。”总之，寿昌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分则为正德利用厚生三项，合

① 邱楠：《复兴民族与复兴民族精神》，《华北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

② 寿昌：《中华民族精神之复兴与亚洲的未来》，《建国月刊》第9卷第4期，1933年。

③ 林景尹：《发扬固有文化振兴民族精神》，《黄胄周刊》第1期，1937年。

④ 郭沫若：《复兴民族的真谛》，转引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⑤ 王鲁季：《论中国民族之精神》，《军需杂志》第33卷，1935年10月，转引自郑师渠 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149—154页。

⑥ 郑贞文：《发扬民族精神》，《现代青年》（福州）新1卷第3期，1940年。

则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理想了。”<sup>①</sup>

郭沫若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概括为：“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他指出，我们的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所固有的文化，仍然在世界上焕发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语言、文字、思想，还是文艺、产业、生活，其中都有我们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在创造文化的同时，还想方设法把自己先进的文化推广到四周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使“我们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得到了丰饶的享受”，通过文化的同化，这些落后的兄弟民族也进入到了“文明的畛域”。中华民族不仅善于创造文化，而且还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如印度的佛法、西域的音乐、斯基泰的艺术、希腊的星历，等等，都曾为我们民族所吸收，并“化为了我们自己的血、自己的肉”，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尤其具有反侵略的优良传统，“我们不曾以武力去侵略过别人，但遇着别人以武力来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彻底的反抗，纵使绵亘至二、三百年，非常侵略者消灭或同化，我们永不中止。”然而中华民族的上述精神，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无可讳言”的遭到了重大“损失”，中华民族也因此“由进取变而为保守，由坚毅变而为懦弱，由生动变而为僵化，由自信自力变而为自暴自弃，”从世界上的先进民族变而成了落后的民族，并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难。因此，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首先就必须复兴我们的民族精神，“尽量地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sup>②</sup>

在吴坤淦看来，民族精神是伴随着民族道德而生长、形成的，两者互相益彰，互相影响，所以我们“要考究什么是民族精神，便先明了什么是民族道德”。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呢？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可以用“忠孝”、“仁受”、“信义”、“和平”八字来概括。与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相伴而生、相伴而长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勇武”、“博大”、“勤奋”和“坚忍”。这八个字，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中国的国魂。”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实现民族的复兴，就必须恢复“勇武”、“博大”、“勤奋”、“坚忍”的“民族精神”，使之“焕发于东亚，弘扬于宇宙。”<sup>③</sup>刘琦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适应环境或改变生活的能力，所以民族的生活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具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就中华民族来看，我们的祖先最先活动的区域是在山东、河南、安徽的北部、河北、山西的南部一带。这一带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所以生立方式虽然简单幼稚，但生活资料的获得并不十分困难，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就显得特别旺盛。早在殷周时代，当欧美还过去原始人的野蛮生活时，中华民族就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无论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各科学，还是天文、气象、历算和制造，都处于世界的前例。所以“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之一。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之二是“战斗精神”。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民族斗争。“中国民族每经一次斗争，民族势力就扩张一次，终造成今日融合汉、满、蒙、回、藏、苗的大中华民族，这就是战斗精神的成果。”然而清代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战斗精神”都逐渐“消失了”，中国也“因而陷于今日的危殆境地”。因此，“我们反本求源，要解放民族，复兴国家”，就必须恢复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战斗精神”。<sup>④</sup>

### 三

知识界在讨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还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什么到清代

① 寿昌：《中华民族精神之复兴与亚洲的未来》，《建国月刊》第9卷第4期，1933年。

② 郭沫若：《复兴民族的真谛》，转引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册），第11—13页。

③ 吴坤淦：《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二》，转引自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224—231页。

④ 刘琦：《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四》，转引自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245页。

以后尤其是近代以来会逐渐颓废甚至消失的原因。杨兴高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受“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被异族征服之结果”。首先就“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言,他指出,中国成为东亚强国后,为了安抚四邻诸国,则采取了一系列的“世界主义之政策”,这些政策虽然有利于“消灭”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思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行之既久,本国民族亦会受到影响,而变为满含世界主义思想之民族。“世界主义思想既盛行于全国,则固有民族之精神与意识自然归之于消灭。”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以会逐渐衰落甚至消失的原因之一。其次从“被异族征服之结果”来看,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欲使中国多数民族,受其少数民族统治,且永远受其统治而无反抗复国之思想发生”,则想方设法消灭多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如焚毁含有民族思想的书籍,使其忘却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大兴文字狱,使人不敢宣传民族主义思想;设科举,以消灭其人民之心思才力;对亲近者透之以爵禄,对反抗者,威之以杀戮;等等,其结果,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遂为之消灭殆尽”。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以会逐渐衰落甚至消失的原因之二。<sup>①</sup>

吴鼎第强调,民族精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国家“和一的情感”,这种情感足以联系国民对内的团结和敌忾同仇的觉悟。就中华民族精神而言,它主要表现为“至刚”和“至大”这两个方面。在古代,由于中国长期处在世界的先进地位,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是很强的,所以,尽管有“异族为患”,也有印度文化的东来,但中华民族之“至刚”和“至大”的精神“仍嬗衍未替”。然而自鸦片战争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初则中国尚存自大,终以睡狮被人家看破,乃由自傲一变而为自卑,自卑再变为媚外。”举凡外国的一事一物,皆盲目崇拜,以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别人,“驯至自信力失去”,“‘刚’、‘大’的精神荡然无存”,再加上清代吏治腐败,节操不讲,舆论不顾,对外国的侵略“已麻木不仁”,“民族精神”也因而“丧失殆尽”。<sup>②</sup>在刘琦看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消失“自有其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中国自商周以后,多次受到异民族的危害,尤其是满族建立清朝后,起初采用暴力政策,大肆屠杀,以震慑人民,继又采取以汉制汉的阴谋,使一般高等知识分子受利禄的诱惑,心甘情愿地为清朝服务。“这样经过长期统治,民族意识,因以完全消沉了。”再加上受老庄虚无思想和印度佛教出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西化、奴化思想的影响,“使中国民族道德堕落了,民族精神消失了。”<sup>③</sup>

陈茹玄认为,造成“我国民族精神的颓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醉心西洋文化的结果”;“第二种是受频年内战的影响”。他指出:西洋文化有它的长处,尤其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我们应当效法。但自欧风东渐以来,国人震于西方的物质文明,盲目崇拜,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而中国的一切都不好,以至于将一切国粹完全抹杀,旧有道德、旧有礼教都要打倒,甚至连汉字都主张废弃不用,而改用西方的罗马文字,见洋货即欢迎,遇洋人即崇拜,人民如此,官吏如此,男女老幼莫不如此,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一味地迷信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又怎么能得到保存呢?自民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无年不战,无地不战,和平两字,更不复存于脑海。”而内战的结果,使“民族精神,日见枯萎”。因为,内战“即是自相残杀,兄弟可成寇仇,骨肉皆成冰炭,益以循环报复,反复无常,亲爱团结的精神,因以摧残净尽;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各种美德,因之亦斩丧无余。”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美德,乃是中华民族精神所寄,今以内战而全被摧毁,民族精神自然日即颓败。”<sup>④</sup>在俊荣看来,除了“受频年内战之影响”外,“民族间之隔膜”也是造成“民族精衰退之最大原因”之一。他在《复兴民族精神问题之探讨》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而各民族间由于历

① 杨兴高:《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与吸收外来文化》,《新文化月刊》第6期,1937年6月25日。

② 吴鼎第:《综论民族精神》,《复兴月刊》第5卷第8号,1937年4月15日。

③ 刘琦:《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四》,转引自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245页。

④ 陈茹玄:《我国民族精神颓败之原因及其挽救方法》,《时代公论》第28号,1932年10月7日。

史地理等原因,发展的程度有快有慢,居于中原地区的汉族发展得相对快些,而其他居于边疆的民族发展得相对慢些,汉族因而自尊自大,自称天朝上国,而称四周其他民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对这些民族实行所谓的“羁縻政策,未得治本之方,仅言治标之策,致各民族间猜忌相生,隔膜日增”,尤其到了近代以后,各民族“不能团结一致,以共救国,是以五族之整个前途,为外人得乘间诱惑”,民族之精神也因而“颓废日成”。<sup>①</sup>

钟焕臻的《怎样恢复中华民族精神》一文,从“远因”和“近因”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消沉”的原因。他指出: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学术横行,一般人民受邪说蛊惑,缺少固有思想,以坚其信念,而民族精神从此开始动摇。汉唐时,佛教传入中国,“寂静无为”的思想,深入人民脑际,此亦影响民族精神甚大。至东晋南宋时,朝野人士,崇尚清谈,苟安求全,竟酿成心愆二帝与徽钦二宗被掳的惨剧。当是时程朱之学盛行,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一般社会,只知有利,不知有义,只知有物欲,不知有廉耻,此种空虚不合实际的学理,遂造成千余年来物欲横流的恶习。迄至清代,满清统治者对我们民族性的摧残,无所不至,二百年的高压,中华民族屈于威力之下,只知道对满清歌功颂德,表现出的是一种敷衍妥协的精神。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清朝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华民族仅存的一点民族自信力也因而丧失殆尽。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消沉”的“远因”。“中华民族精神的消沉”的“近因”又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分析。“外因”主要指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导致的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内因”主要指的是中华民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通病”,如无团结心,无责任心,缺乏毅力,自私自利,不重实际等,而这些“通病”的“病根”,在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缺乏民族意识,故民族思想淡薄,受其影响,对外缺乏抵抗力,对内缺乏团结力。因此,中华民族不图复兴则已,如图复兴,则“非着手复兴民族精神的工作不可”。<sup>②</sup>

笔名为“觉群”的作者重点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对“中华民族精神消沉”的影响。他指出,“帝国主义的压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天然淘汰力的压迫”。中华民族之所以“常为同化他族的主体,而能遗流繁盛到现在”,除了“高尚的文化”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众多,因此那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尽管有时占领了中国,甚至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但最后都被中华民族所同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现在侵略中国的东西方列强,不仅文明程度高,而且人口增长很快,“较之百年以前,德增两倍半,俄增四倍,英日三倍,美十倍”,而反观我国,因受天灾人祸的影响,人口增长很慢,乾隆时统计是四万万,前年(1932年)统计是四万万五千万,200多年间才增加五千万人口。正如孙中山所说担忧的那样,两相比较之下,中华民族在天然淘汰力的压迫之下至多仅可支撑100年。二是“政治上的压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东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丧失,领土被分割不少,民族地位一落千丈,已完全沦为“次殖民地”的国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三是“经济上的压迫”。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给予的优势地位和自身经济上的优势,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中国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正是在帝国主义这三方面的压迫之下,一些人产生了“仰慕敬惧外人的心理”,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民族自信力自尊心因而丧失。“最可痛心的,即‘惧外’之不足,更加之以‘媚外’;‘媚外’之不足,又加以‘恃外’。这样一来,惧外媚外恃外三种心理同时并存,民族精神更丧失净尽了。”而民族精神的丧失净尽,又导致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薄弱,只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丝毫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大多数人抱着苟且偷安的心理,遇事持一种畏难敷衍的态度。凡此种

① 俊荣:《复兴民族精神问题之探讨》,《突岷》第1卷第3期,1934年。

② 钟焕臻:《怎样恢复中华民族精神》,《觉是青年》第1卷第2期,1934年。

种说明：“中华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很显然地是消沉了”。<sup>①</sup>

除了分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所以会逐渐颓废甚至消失的原因外，知识界还重点探讨了如何恢复或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问题。吴鼎第认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关系非常紧密，“我们要能复兴民族，使民族精神健全，须先有民族意识。有了民族意识，然后才有健全的民族精神。”而“要有民族意识，须先具备国家的印象；有了国家印象，更需有复兴民族的自信力，这样健全的民族意识才能完成。”所谓“国家印象”，也就是国民要关心国家，要热爱国家，要知道“现在民族兴衰怎样，未来的邦国前途怎样”。但仅有“国家印象”还不够，还需要有“民族自信力”，要相信自己能复兴民族，并担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总之，吴鼎第强调：“民族意识由国家的印象发动，由自信力推进，终乃形成健全的民族精神。由环境的刺激，反省诸已，谋取民族的出路——于此情状下产生的民族精神才是切实的，正确的，远大的，积极的，乐观的，勇敢的。”<sup>②</sup>

张君勱也特别强调民族意识的有无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乃至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他1933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时指出：民族犹如个人，个人生于天地间，不能离开物质与精神，民族亦然。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意识。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亦在于民族有意识。“民族意识，乃民族之第一基本”。而民族意识，又具体表现在“民族情爱”、“民族智力”和“民族意力”三个方面。所谓“民族情爱”，亦即作为民族一份子的个人对本民族的感情；“民族智力”，亦即民族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具有民族特点的独立学术；“民族意力”，亦即民族的统一意志力或执行力。我们要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就“先则须从教养入手”，使国民的“民族情爱、民族智力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终则为行动之统一。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

雷震对于费希特以国家高于个人，为谋求祖国的独立与生存而限制个人自由、舍身赴难的精神非常赞赏，在谈到如何恢复民族精神时，他特别肯定“菲希特以为唤起民族感情，涵养爱国热情之方法，莫过于从奖励教育着手”的主张，认为“我们要恢复民族精神，根本要从人格教育做起，无论何人，不能否认。不过我们过去的教育，不但没有养成健全的人格，连知识方面都不能满足，真是惭愧。我们今后以努力教育，尤其要注意人格教育，才能恢复民族精神，才能真正挽救中国。”<sup>③</sup>陈茹玄认为，我们要恢复或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键在于“认清使民族精神颓败的两点重要原因，根本矫正”。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尽力消弥内战，以不合作的方法来对待那些兴风作浪的军阀政客，人人以参加内战为可耻，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美德”；另一方面，要养成民族自尊自重的精神，自尊自重并非妄自尊大，更不是要固步自封，拒绝学习他人，而是“自信其本能，自尊其人格”，学习他人的目的，是取人之长，以为己有，“断非自残自弃，投降他人”。<sup>④</sup>俊荣指出，我们“欲从事于民族复兴之道，首先必认清民族精神衰颓之重要原因，根本矫正。”如前所述，在他看来，民族精神衰颓的主要原因，一是“受频年内战之影响”，二是“民族间之隔膜”。因此，他认为恢复民族精神，就必须“一方面便尽力消弭内战，使人人以参加内战为可耻；另一方为谋五族整个之团结，联五族为一家，化仇敌为兄弟，共同担任挽救颓败民族之精神，恢复仁爱忠信诸美德，以养成民族自信自重之精神，爱国爱民之仁心，民族精神恢复，则不患列强之加于我也。”<sup>⑤</sup>

顾养元就“如何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转移家族观念发挥民族意识”。他指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乡土观念非常浓厚，而民族意识则向不发达，影响所及，使四万万人民成了一

① 觉群：《中华民族精神消沉之原因及其恢复之我见》，《警醒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

② 吴鼎第：《综论民族精神》，《复兴月刊》第5卷第8期，1937年4月15日。

③ 雷震：《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时代公论》第29号，1932年10月14日。

④ 陈茹玄：《我国民族精神颓败之原因及其挽救方法》，《时代公论》第28号，1932年10月7日。

⑤ 俊荣：《复兴民族精神问题之探讨》，《突岬》第1卷第3期，1934年。

盘散沙,没有团结,每个人都只知道个人的重要,而不知道自己和民族的密切关系,更没有自己的民族和他民族不同的思想,同族间的关系因而十分浅薄,感情不深,没有树立起同民族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的民族观念来。因此,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就必须从家族观念发展出民族意识,有了民族意识,民族思想才会发达,民族团结才能坚固,同时才肯牺牲自己的利益,努力图谋民族的生存。第二、“培养民族美德铲除不良特性”。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民族性,这种特性,有的不仅要保持,并且要发扬光大,有的则要设法铲除,不使遗留。我们中华民族的特性应当保存和发扬光大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美德,应当培养和鼓励的,是豪侠牺牲勇敢爱群诚实纪律等风尚,应当设法铲除的,是优柔寡断浪漫消沉自私自利的观念,只有当人人都能与民族共生存,同休戚,为民族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时,民族精神才能从颓废走向复兴。第三、“坚强自信能力祛除畏外心理”。鸦片战争之前,国人的自信力是满满的。但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对外心理几经变迁,每变迁一次,民族精神即堕落一次,民族自信力也随之降低,以至于对外人怀一种畏惧心理,自认为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欧美民族为优等级民族,中华民族的一切文明制度和思想学说都不值一顾,而不管适合中国需要与否,欧美民族的文明制度和思想学说都是极有价值的宝贝。如此,民族精神那有不颓废之理。故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只要人心不死,无论民族精神如何颓废,都可以复兴起来,关键要看民族自信力如何。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精神,就必须“祛除民族畏外心理,坚强民族的自信力”。<sup>①</sup>

蔡衡溪认为,“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因为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一种特性,而民族特性的形成,则与某一地方的物质条件和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乡土教育便可以将此种物质和历史的关系介绍给国民,使他们能认识其特点,发现其价值,并加以维持和发扬,从而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这是“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的第一个理由”。除了物质条件和历史外,民族精神的形成与乡土风习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乡土有俭约的风习,便可以形成民族节制而不浪费的精神,乡土有劳动的风习,便可以形成民族勤劳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精神,必先设法保存和发扬乡土固有的优良风习,而欲保存和发扬乡土固有的优良风习,则必须实施乡土教育。这是“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的第二个理由”。此外,乡土信念为民族自信力之母,一个民族只有在了解乡土信念的基础上,才可以培养起民族的自信力。而乡土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乡土信念,从而为民族自信力的养成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的第三个理由”。如果说乡土信念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那么,乡土观念则是民族意识的基础。中国人民的乡土观念素重,无论何人,对于本乡本土总是觉得十分眷念,肯去卫护,甚至对于乡土之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乐于乡土的情怀,就是一种乡土的观念,将这种观念扩大起来,便就成了民族的意识。所以说民族意识的形成,是由乡土观念发展而来的。乡土观念既然是民族意识的根本,那么我们要培养民族意识,就只能从培养乡土观念始,而要培养乡土观念,就离不开乡土教育。这是“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的第四个理由”。尤其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些旧的道德观念,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虽在城市中多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它们在乡土人民的心目中还“遗留着不少的痕迹”,“这种潜在于乡土间的旧道德,我们如果给以相当教育的指导,也必定可以作为民族精神复兴之基础,这更是复兴民族精神应从提倡乡土教育做起之重要的理由。”总之,蔡衡溪指出,乡土内容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极深,民族精神的形成大半基于乡土之习惯及观念,如不谋乡土之习惯及观念的维护和发展,而只图民族精神之唤起,那不过是空洞的口号而已,“也就是说,如果讲复兴民族,而不谈乡土教育之实施,则民族精神也是终无复兴之一日,所以我说,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

<sup>①</sup> 顾养元:《如何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江苏教育》第3卷第1、2期合刊,1934年。

育。”<sup>①</sup>曹中权则主张加强师范教育,充分发挥师范教育在“复兴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因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是民族精神的原动力,师范教育尤为一般教育之基础,征诸各国教育的发展,无不以师范教育为实现其目的之工具,“其民族之兴替,其国民思想行动之方向,大都视师范教育为转移。”<sup>②</sup>

1939年,“民意周刊社”曾以“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为题向全国征文,讨论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同年11月,获征文前五名的文章由独立出版社结集出版。吴锡泽指出,民族道德是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民族精神之所以涣散,原因就在于民族道德的堕落,历史上民族精神最消沉的时期,也是民族道德最堕落的时期,所以,“欲发扬民族精神须先提高民族道德”。<sup>③</sup>吴坤淦通过具体考察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形成的历史后得出结论:民族精神初出于民族道德,但是出生以后便伴着民族道德共同发展。翻开中外历史,任何国家都逃不出这个规律。所以,自从封建政治发生以来,一个国家的道德愈良好,则民族精神亦愈焕发;民族精神愈焕发,则民族道德也愈高尚。“二者乃互为影响,互为益彰,如车辅之相依,实相需而相成。”因此,我们要恢复或复兴民族精神,就须同时恢复或复兴民族道德。<sup>④</sup>周明道认为,民族精神,含蓄于民族道德之中;而民族道德,又寄托在个人的人生观和全体的社会气节之中。不同的人生观和社会气节,形成不同的社会道德,产生不同的民族精神,最后影响到整个国运的盛衰、民族的盛衰。所以,我们要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须当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要发扬民族精神,当培植社会道德;首先应当做的工作,便是培植我们的人生观和社会气节。”<sup>⑤</sup>

#### 四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力量之源,是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它能对该民族的成员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能够唤起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能够激励该民族的成员为本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而团结奋斗。随着“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知识界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恢复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尽管由于政治取向和文化取向的不同以及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认识各有不同,但都是从正面认识和肯定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尤其是他们有感于中华民族精神日渐颓废甚至消失,而提出了种种恢复或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张或措施,如培养民族意识,去掉洋化心理,追怀本民族的光荣历史,重视教育尤其是人格的教育,树立民族的自尊自信,消弥内战,处理好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欲发扬民族精神须先提高民族道德”,等等,这些主张或措施不仅是针对他们当时所生存的时代而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就是现在看来,其中许多观点仍然有其借鉴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吸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后的知识界在讨论民族精神时,他们中已有人认识到,“民族复兴运动,并不是回复到旧的民族精神,而是旧的民族精神之展开,换句话说,即是根据旧的民族精神为新的民族精神的创建。”<sup>⑥</sup>这一认识在今天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田明孝

① 蔡衡溪:《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河南教育月刊》第5卷第2期,1934年。

② 曹中权:《民族精神与师范教育》,《江苏教育》第3卷第1、2期合刊,1934年。

③ 吴锡泽:《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一》,转引自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212—221页。

④ 吴坤淦:《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二》,转引自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224页。

⑤ 周明道:《民族道德与民族精神之三》,转引自郑师渠、史革新主编:《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研究读本》,第234—235页。

⑥ 罗敦伟:《中山文化与本位文化》,《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10日。